

社会地位的内涵、演进及其类型

——兼论我国当代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

□ 周兆海,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社会地位是个人(群体)之间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秩序安排。社会地位的出现,一方面生存发展需要,即生存逻辑,一方面是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依从和尊重,即道德逻辑。而其生成逻辑历经四个阶段:原始社会,弱生存逻辑且弱道德逻辑;部落社会,强生存逻辑而弱道德逻辑;农业社会,弱生存逻辑而强道德逻辑;工业社会,既强生存逻辑又强道德逻辑。因长期面临总体性生存性资源紧张,我国当代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是:重生生存逻辑而轻道德逻辑,体制内外的地位分殊和城乡社会空间地位等级化。

[关键词] 社会地位;生存逻辑;道德逻辑;城乡二元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7.026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5)07-0142-004

目前社会地位的理论主要来自于经典社会学。经典社会学产生于西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之际。正是由此,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1]而工业社会的社会地位分析,一般着重于职业的评价和对社会资源的获取,而忽略社会结构本身对社会地位的规定。我国工业化发展滞后,至今仍未完成现代化转型,考虑到我国社会发展与西方社会的时空差异,若仅用经典社会学理论显然不足以深刻分析我国个人(群体)社会地位的历史样态和变迁路径。因此,基于现有社会学理论来凝炼社会地位的内涵和梳理社会地位的类型是学理阐释我国个人(群体)社会地位相关问题的前提之要。

1 社会地位的内涵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性动物,自人诞生以来就必须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实现温饱的奋斗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为生存的目的却是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获得物品和服务多少以

及解决问题和赋予实践意义的能力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个人(群体)在影响和决定他人命运以及获得他人评价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产生社会等级排列。因此,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或某一群体中成员所取得的特定位置”,^[2]实质上是个人(群体)之间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秩序安排,是个人(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有社会,无论大小,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这样的等级排列现象:领导者和社会声望高的人位于顶端,其他人排在中间位置,还有一些人处在社会等级的低层。^{[3](P1)}

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生存和维护生存是人类一直在回应的问题。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4](P25)}由于每个人的生存地位并不完全是由他在经济和社会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除了生存竞争法则支配的世俗秩序外,还有一种道德秩序,即道德价值。^{[5](P59)}因此,社会等级序列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是源于当前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个人(群体)社会地位依据其身上附着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4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ZZ1201)。

作者简介:周兆海(1987-),男,江西兴国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生;邬志辉(1966-),男,黑龙江鸡西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生存性资源的多少而定,即遵循的是生存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基于对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的依从和尊重,个人(群体)社会地位因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声望资源和公民资源等道德性资源而定,即遵循的是道德逻辑。另外,也可以是综合上述两大逻辑来判定个人(群体)的社会地位。

2 社会地位的演进与类型

自人类发展史有考以来,维持生存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但不断创造、丰富以及继承传统价值才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并不断走向更高文明程度的核心所在,遵循道德逻辑才是文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永恒主题。因此,发展过程中的人类社会遵循或生存逻辑,或道德逻辑,或综合二者来进行社会等级排序。正如一位观察家略带夸张地指出,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是奴役的过程,当人类结束游牧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分层、不平等、精英、剥削就出现了。毫不过分地说,文明的历史就是社会阶层化的历史。^{[6](457)}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不一,综合判断人(群体)社会地位所遵循的逻辑也有区别。就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判定个人(群体)社会地位的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原始社会,弱生存逻辑且弱道德逻辑。这一时期人类刚脱胎于动物,加之生存环境恶劣和文明程度低,社会运行的唯一准则是生存才是王道。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个人(群体)之间没有相互组合成结构性社会,社会等级排序也就没有形成。第二阶段属于部落社会,强生存逻辑而弱道德逻辑。在此时期,生存环境未有根本性改观,但人类为生存而聚居结成社会并生成一定的社会规则。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总体上秩序较为混乱且崇尚武力,并存在建立在年龄、性别和个人特性基础上轻微不平等,这些特性包括勇气、狩猎技巧和部落战争等生存性技能和能力。^{[7](470)}因此,在这个阶段获得生存物品和服务的多少的能力决定个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第三阶段属于农业社会,弱生存逻辑而强道德逻辑。在此阶段,生存环境得到根本性改观,而且人类社会业已形成稳定且系统的传统价值。尽管生存仍是此一阶段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此时人类社会已分化成两大群体——拥有财富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统治阶级,这两大群体的生存空间和压力相对封闭和稳定,社会等

级序列分明有致。因此,在各自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内,个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决定于其是否遵照传统价值及其具体表现,并以此形成诸多社会规范。在统治阶级社会内部,社会规范是规章制度加以确定,并被官方传诵和推崇,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规范一部分来自附庸于统治阶级的风雅,另一部分多半没有形成文字,个人与个人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触及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工作到此种社会所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休闲活动,无不被触及。^{[8](49)}每个人都极为尊重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并努力成为价值秩序的示范者,以此标榜身份和显示社会地位。第四阶段属于工业社会,既强生存逻辑又强道德逻辑。在工业社会,人类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已不同于前,一方面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大大提高了社会总生产力,这使得社会生产的生存性资源总量远高于社会需求。不过,这种生存性资源供大于需的关系仅表现在生产层面,而社会未因生存环境的改观来实现道德层面的跃升,反而是供大于需激发了社会的消费欲望,这就造成后续供不足于需的局面,引起社会对生存性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另一方面生存性资源也全面扩散,维持个人(群体)生存的物品和服务已变为社会化生产,由过去向自然索取变为现在向社会购买。个人(群体)必须要在生产、流通和销售的一个或者多个环节付出劳动才能得到相应的物品和服务,否则,就得面临挨饿的窘境。因此,在工业社会,个人(群体)维持自身生存和影响他者生存的能力大小和拥有生存性资源的多少影响其社会地位高低。另外,原有农业社会出现结构性解体,两大群体脱嵌于各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系统,并渐次建构起相对多元和开放的社会序列。在此过程中,虽然社会运行方式发生较大改变,社会对传统价值有所扬弃,但与部落社会时期几乎出于生存本能来决定个人(群体)社会地位不同,现代社会处于较高的文明程度,无论个人(群体)还是社会之间的交往程度,还是社会生产和运行的分工及合作都较以往更为复杂,这也更需要道德伦理来调节,以及过往历史证明尊崇传统价值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有序发展,这使得工业社会仍注重遵循传统价值在社会地位评价中参照作用。因此,个人(群体)社会地位根植于所处的社会形态,而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不同(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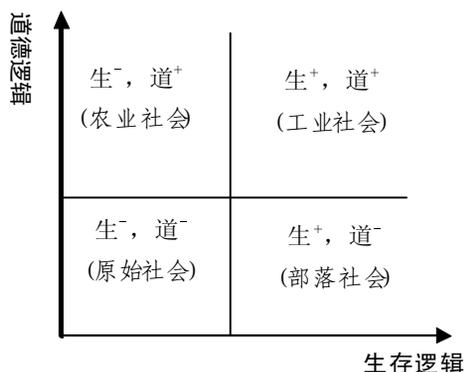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地位演进逻辑与类型图

3 我国当代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

既因西方列强所推动,又受其所掠夺,我国工业化在初期进程较为缓慢,城市的生产功能^①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加之城乡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生存性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我国城乡社会生存性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极为紧张,进而出现总体性资源危机,“由此造成乡村社会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的民变”,引发城乡社会“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并存与共构的整体性危机”,^[9]以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仍在持续推动的工业化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民族复兴运动。正是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先天不足,加之后天发展滞后,当下中国社会的生存性资源在生产、交换和配置有异于一般工业社会,以致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也异于一般工业社会。

首先,重生存逻辑而轻道德逻辑。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生产功能不足且农村生产力提升有限,导致社会总体的生存性资源供给无法满足不断增长城乡人口的数量需求,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消费需求,从而形成社会总体性生存性资源长期不足的局面。改革开放前,对资源配置和占有基本由国家体制支配,社会各群体还可以在同一社会框架下分享生存性资源,彼此间的社会地位判定逻辑服从于国家体制建制等级区分,含有革命道义情结。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个人(群体)逐步脱嵌于单位和社会供给体系,变为需依靠自致能力参与市场生产、交换和购买来获得生存性资源。虽然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技术和管理理念,激活了城市生产功能的发挥,而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则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生产效率,使得社会总体性生存性资源紧张程度得到缓解乃至得到根本性改观,但从“80年代后期始,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10]等社会现象体现资源走向积聚,使得多数个人(群体)仍面临生存性资源紧张,处在资源竞争状态。加之历次革命运动瓦解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传统道德和价值信仰失去了社会文化依托,以致当代个人(群体)间的道德互动关系式微。因此,在生存性资源紧张和道德互动关系式微的双重作用下,当代个人(群体)社会地位的生成逻辑是重生存而轻道德。

其次,体制内外的地位分殊。正是由于社会总体性生存性资源紧张,为了更好地整合社会,同时集中资源促进工业化,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就着力建构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和分配能力,造成全社会对国家体制的高度依附。在这种体制下,国家能够突然地转移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相对资源,从而改变他们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样的资源转换通常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考虑,而不是以市场效率为依据的。^{[11](P384)}虽然近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弱化了国家体制在资源再分配中的作用,中央也着力推动体制内企事业单位转制,但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导致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的效应持续至今。^[12]国家体制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仍起着重要影响,甚至在某些领域起着支配性作用。至今,市场分配主导下的工业发展仍以劳动密集型和加工型为主,庞大的工业生产人口虽努力劳动付出,但薪酬较低,且多数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缺乏相应保障。与以财政体系支付薪酬、社保和医疗,以及子女教育享有优先权的体制内相比,体制外个人(群体)的生存境况虽有改观但总体不如。是否身处体制内外,在当下仍可用来区分个人(群体)社会地位的高低。

再次,城乡社会空间的地位等级化。自农业社会始,我国社会就逐步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大社会形态。在此过程中,城乡社会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分异,而且生成地理空间上的社会等级化,即“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社会地位、资源享受上不平等的身份性二元社会地

韦伯(Max Weber)认为城市有三种类型: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和商人城市,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202页。基于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努力、城市社会组织形式和城乡资源配置方式的分析,我国多数城市应属于生产者城市,更多发挥的是生产功能。

位体系”。^[13]在古代中国即有所谓的“国人”“野人”之分,“国人”就是指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野人”就是指在城外、乡下居住的人。^[14]时至今日,我国城乡社会空间的地位等级化不仅未因政治进步而消解,反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进一步被强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城乡社会发展自发秩序所致。步入工业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工业化使得城市也具备生产功能,且其所生产的生存性资源远大于农村社会。生存性资源城乡分布不平衡对城乡社会带来两大方面变动:一是农村社会逐步卷入到以城市为主的工业化生产进程中,农村社会精英迁入城市,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瓦解;二是城市精英主导全社会资源的分配,城乡社会空间等级格局发生变动。这些变动加剧了城乡社会在资源生产、交换和配置中地位差距。另一方面,是由国家体制规定人为造成。建国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避免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带来城市生存性资源紧张和农村生产功能下降的并发危机,同时为了推动城市的工业化,政府建构起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一方面,以户籍为媒介,严控城乡人口流动,“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稳定在农业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为国家生产更多的商品粮和其他剩余农产品”。^[15]另一方面,以财政赋税的形式,强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及城市对农村的资源支配权,“国家不但把绝大部分公共资源配置给城市,而且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将农村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平调,建构了城市支配和剥夺农村但又严重依赖农村的城乡关系格局”。^[16](p258)]在21世纪的今天,尽管城乡人口流动已高度自主化,国家也加强了公共服务向农村供给的力度,但既有城乡社会发展累积差距使得城乡社会空间的地位等级化日趋严重,甚至有社会等级序列“断裂”趋势。在市场经济主导下,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越来越小,越来越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一个体系,而农村愈发成为这个体系中一个多余的、甚至多少有些负担的部分。^[17]因此,在公共服务户籍属地化管理的当下,进城务工、求学、工作和定居是当代个人(群体)实现社会地位转换的普遍形式和追求,而这个追求实现与否也是社会判定个人(群体)社会地位高低的直接依据。

参考文献:

- [1]周晓虹.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4).
- [2]咎宝毅.社会地位与角色[J].社会,1987,(1).
- [3]丹尼尔·U·莱文,瑞伊娜·F·莱文.教育社会学(第九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5]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6]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7]斯蒂芬·K·桑德森.宏观社会学(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8]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9]王先明.20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冲突的演变及其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 [10]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J].战略与管理,2002,(1).
- [11]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2]边燕杰,李路路等.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 [13]王春光.城乡结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迟滞者[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14]李培林.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06.
- [15]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 [1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7]孙立平.对社会二元结构的新认识[J].学习月刊,2007,(1)上.

责任编辑 梅瑞祥